



華大
博雅
名家讲坛

章开沅

演讲访谈录

章开沅 著

博雅名家讲坛
B Y M J J T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章

博雅名家讲坛

章

章

博雅名家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开沅演讲访谈录/章开沅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博雅名家讲坛)

ISBN 978-7-5622-4088-4

I. 章… II. 章…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722 号

章开沅演讲访谈录

作者:章开沅◎

责任编辑:庄 鹏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 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93 千字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7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4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史学思索

- 003 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
017 危兆盖：关心社会 参与历史——访章开沅教授
020 李平生：章开沅教授与中国近现代史写作
033 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
045 赵颖：大象无形——章开沅先生访谈录
060 陈才俊：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
——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呼唤人文

- 075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080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
090 章开沅教授谈打首义牌
092 首义文化区感言
096 获奖感言
098 有感于文化创新——从与池田大作对话说起
105 三个问题
108 泰晤士河源头的思考——从“牛津现象”谈起

维护和平

- 113 在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上的讲话
114 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
118 李永升，董淑健：血写的历史不会被掩埋
——章开沅教授谈“贝德士文献”发掘始末

- 120 在“亚太和平与公正联合会宴会”上的讲话
- 122 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 135 殊途而同归——与池田先生的相遇与相知
- 139 寻踪樱花

教书育人

- 143 春风化雨，桃李芳菲——向第一个教师节献词
- 146 在索菲亚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 150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 155 彤新春，刘秀枝：章开沅：好制度比好校长更为重要
- 158 与一位普通考生的通信
- 162 纪念“五四” 超越“五四”
- 168 “20后”寄语“90后”
- 172 教育就是完善自己
- 174 量化评审是学风不正的根源之一

痴迷辛亥

- 18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
- 196 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
- 212 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
- 219 辛亥革命的意义与纪念馆的建设
- 224 纪念馆的地位、功能及其发展方向
- 232 在“三个中心”的道路上迈进
- 236 珍惜辛亥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
- 242 辛亥学脉，世代绵延

249 百年以后看同盟会

基督宗教

259 “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262 基督教与“五四”运动

267 世纪之思

272 世局变迁与宗教发展——以教会大学史研究为视角

283 献词

285 “中华归主”与“主归中华”

289 追求和谐

品评人物

297 孙中山与宫崎兄弟

305 对于张謇的再认识

315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思考

320 艰难的探索——对五权宪法的再认识

327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对容闳的再认识

330 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

337 张謇与日本

348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张謇研究

352 感言——纪念史华慈诞辰 90 周年

历史寻踪

357 历史寻踪

366 湖笔文化与章氏家族

附录

- 383 跨世纪的思考——欲速则不达，夜长而梦多
- 389 戈玲：革命令章开沅选择研究历史
- 392 黄宣传：独寻真知启后人——访史学家章开沅教授
- 395 周洁，李卫中：良知之旅——与历史学家章开沅的对话
- 400 燕青：章开沅：80岁的浪漫主义者
- 404 燕青，吴丹，刘春燕：95周年纪念是100周年的预演——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接受《长江商报》专访畅谈首义精神
- 409 刘春燕：章开沅：首义精神就是武汉的“魂”
- 411 毛光勇：著名史学家章开沅评八艺节开幕式：象征湖北在中部崛起
- 413 魏文享：史学、人生与时代——章开沅先生访谈漫记



史学思索

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

(1983年8月在上海“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
上几次发言的综合文稿)

自从1981年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日益兴味盎然。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外学者通过直接交换意见，增进了各种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了解。我们高兴地看到，两年以来，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这一课题的研究又有许多可喜的进展。但也应该承认，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仍然具有某种程度幼年期的特点，许许多多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更多的学者以更多的精力共同探索。

每当我阅读列宁《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第1版序言的时候，总是被他那永远不知满足的科学追求精神所感动。他严格地审视了自己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并且明确指出这本名著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弱点：（一）“专门从国内市场的观点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而不谈到国外市场的问题和对外贸易的材料”。（二）“只限于改革后的时代”。（三）“采用的主要是而且几乎完全是俄罗斯内部各省的资料”。（四）“只是专门研究过程的经济方面”。根据我的粗略理解，列宁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四个问题的重要性，即：（一）应该把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联系起来考察。（二）应该把资本主义的研究向上延伸到它的胚胎萌芽时期。（三）应该注意搜集利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资料。（四）应该把研究领域从经济扩大到政治、文化以至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两者差异甚大，但列宁这种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在研究方法上认真总结的经验，都对我们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结合近几年来与许多中外学者频繁讨论的体会，我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也有在方法上加以改进的必要。现仅就管见所及，提出若干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概 念

加拿大约克大学拉瑞教授在参加武昌学术讨论会以后说得有趣，她本来以为到会的中外学者从一开始就要对“资产阶级”定义争得不可开交，但结果并非如此。根据她的分析，那些能言善辩的西方学者可能是碰到语言的障碍，而历来重视理论的中国学者现在却强调从历史实际出发。当然，概念及其运用的歧义客观上是存在的。拉瑞的同事陈志让教授就曾指出：“中国学者一般采用‘资产阶级’广义的定义，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定义。只有这样才能用‘资产阶级革命者’那个名词，指的不一定是生产关系，而是那些革命者所代表的功能。西方学者如果不放弃狭义的定义，只包括近代的企业家（如工商业家、大金融家），那么俗话说说的‘东是东，西是西’，这两个双生子是永远不会达成协议的。”^①

其实分歧不仅存在于中外学者之间，而且存在于外国学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中国学者之间。例如日本学者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等概念的理解，同意某些西方观点者固然有之，但与中国学者持相近观点者则为数更多。即使是西方学者，乔·勒菲布在《法国革命的到来》一书中，用的也是资产阶级“广义的定义”。我认为，对于“中国学者一般采用资产阶级广义的定义”这种说法，也需要作具体分析。在我国有关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论著中，所谓“广义的定义”实际上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代表”两个方面。陈志让对此是有所理解的，因此他指出，辛亥革命时期那些革命者之所以冠以“资产阶级”，主要是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并不一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直接联系。

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中国学者不大愿意用“资产阶级”的“狭义的定义”，那显然又是一种误解。我国学者通常对“资产阶级”这一概念

^① 陈志让：《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这是作者为他编译的一本中国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文译稿）。

的“狭义的”理解，指的也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直接联系的近代资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雇佣劳动的各种企业主。例如，近年来有些同志常用“资本家阶级”一词^①，当系有意区别于“资产阶级”狭义的概念。至于狭义的“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国内学者论析已多，此处无需赘述。

我有一个不够成熟的看法：中外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似乎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概念的本身，而是在于这个概念的具体运用。一般地说明“资产阶级”的内涵和外延并非难事，难的是在对史事的具体解释中如何将这个概念用得准确贴切。譬如，把一些主要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的实业家称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这是不会引起多少争议的。但历史实际状况总是比理论概念复杂得多，对于在近代中国资本结构中占优势的银钱业和商业，就较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对银钱业而言，票号和钱庄都是封建社会的传统行业，一般都具有储蓄、信贷、汇兑等职能；但封建性更为浓厚的票号显然属于封建高利贷范畴，与为数更多的典当业同样是封建经济的补充；而钱庄在19世纪中叶以后却愈来愈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很多成为近代金融业的从属部分。就商业而言，到20世纪初，传统的封建字号与新兴的各业店行庄棧已是杂然纷陈，对两者性质的区分并非易事。就是许多历史悠久的封建字号，由于日益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和逐渐改变了经营方式，也不能一概以旧式商业论定。至于清末兴起于沿海地区的大型农垦公司，尽管仍以租佃制作为主要经营方式，但却或多或少纳入了资本主义企业体系，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凡此种种，都需要作个体的、集团的、行业的深入研究，既要对企业内部结构进行具体分析，又要把它放在整个生产、流通、分配过程中间来加以考察，然后才有可能对投资经营者（包括所谓“绅商”、“职商”）的阶级属性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应该承认，在我们过去有些论著中，确实存在着使用“资产阶级”一词过于广泛的毛病。这一方面由于概念运用的不够严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深入的具体分析，同时在资料方面也存在着客观的困难。清朝、北洋和国民政府都未曾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精确的经济统计资料，私营企业除少数较大的资本集团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档案以外，一般都是残缺不全甚至片纸不留，至于手工工场、作坊，更谈不上什么自己

^① 丁日初：《辛亥革命前上海资本家的政治活动》，载于《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的档案。官方统计（北洋政府农工商部和各省实业司的调查统计）固然是不堪深究，即便是商会和地方文献记载也大多语焉不详，存在着分类不清或过于笼统等缺陷。在经济史研究中，涉及范畴、概念的质的规定性往往与一定数量界限相联系，而靠大致估算所作的结论必然难以精当。因此，在强调对“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正确理解和运用的同时，还必须加强经济统计资料的搜集、整理、校核、运算，否则所谓具体分析、深入研究云云便缺少足够的数量依据。

二、模 式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一般仍以西方模式为依据。所谓西方，实指西欧。

林增平同志《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已经将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历史情况与欧洲作了比较全面的比较，并且归纳指出其相异之处。如中国“不曾出现任何一个获得自治，摆脱了封建羁绊的城市”；“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欧洲一样的市民等级”^①等。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即便是同属于西方模式的欧洲众多国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成长的情况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且不说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西欧国家有多大差异，也不说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首先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反而最早夭折，就拿德国早期资产阶级与其英、法近邻相比较，差别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当英、法资产阶级已经赢得辉煌胜利并且成为国家主宰多年以后，德国资产阶级依然“宁肯抱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圣罗马粪堆，而不要人民那种勇敢地摆脱奴隶制的锁链并向一切暴君、贵族和僧侣挑战的令人战栗的行动了”^②。甚至连荷兰的资产阶级也比人数众多的德国市民强大，前者已有相当发展的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后者却单纯追求分散的有限的一己私利。这些德国后起的财主之所以在“粪堆”中感到温暖和舒服，是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于忍受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大小王公的专横统治，并且满足于借混水摸鱼发财致富以补偿自己所遭到的压迫和侮辱。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步伐落后于英、法，当他们刚刚开始同封建统治者斗争的时候，“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所有这

① 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2页。

②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5页。

一切,决定了德国早期资产阶级庸俗和妥协的特点,尽管这个民族闪耀着令人目眩的哲理光辉。只是由于外国竞争日益加剧和自身愈来愈卷入世界贸易,条顿主义才从人变成物质,而德国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不知在哪个黄道吉日一变而成为爱国志士了”^①。大约是在1840年以后,德国资产阶级才接近法国人半个世纪以前的水平;但法兰克福议会却无从与国民公会相提并论,他们的希望所在是俾斯麦自上而下的统一。

当然,德国并非最落后的国家。正如恩格斯所曾指出,直到1847年,“欧洲有两个地方还保持着最原始的古基督教德意志式的野蛮,几乎还以橡实为食料,这两个地方就是挪威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即旧瑞士”^②。所谓“旧瑞士”,指的是13世纪到14世纪构成瑞士联盟雏形的东南部山地诸州。这些天主教州落后而又保守,人们按同一方式建筑房屋、制作干酪、生儿育女,甚至按同一方式编束自己的发辫。他们在1843年成立分离派联盟,反对“文明的、工业的、现代民主的瑞士”先进地区要求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进步趋向。恩格斯认为,“旧瑞士”根本没有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完全是封建宗法关系。“它简直像牲畜一样顽固地坚持与整个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闭塞性”。因此,瑞士是在外界影响下,经过激进诸州与落后诸州的内战,终于跻入近代文明国家的行列。它并不需要组织民众奋起攻打巴士底狱,也许“旧瑞士”就是它自己的巴士底狱。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早期的历史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西欧与东欧之间,而且存在于西欧与中欧之间。而无论是在欧洲的哪一部分,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甚至是很不平衡的。因此,所谓西方模式,其统一性也是相对的,它蕴含于许多国家的千差万别之中。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可能把这一模式简单化、绝对化,以致闭塞自己的视野,束缚自己的思想。

人类社会历史确实存在着客观规律,但它在各个国家、地区的具体体现绝非千篇一律,而任何社会形态更不存在什么单一模式。就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而言,有些基本情况是各国具有的,如资本的原始积累、积累、积聚、集中、垄断以至周期性经济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7页。

^② 恩格斯:《瑞士的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5页。

危机等，客观的规律性即寓于其中，并且明显地影响和制约着资产阶级盛衰荣枯的全过程。但由于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表现在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养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再加上不同的时代条件和国际形势，更使得各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千姿百态，各有自己的特色和风貌。人们常用“削足适履”讥讽那些企图用单一模式硬套各国历史的本本主义，就是说不应该以某个或某些国家特定状况为凝固的范型，凡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越雷池一步。当然，也不能由于摒弃单一模式论便走向另一极端，即根本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甚至认为历史呈现的形态变幻无穷，纯粹是由若干大人物的意志、性格或某些其他偶然因素造成的。正确的研究方法应当是：既善于同中见异，又善于异中见同；换句话说也是一样，就是要真正懂得共性寓于个性、一般寓于个别、统一寓于特殊的道理。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最好是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历史的总体中来加以探讨，才能更为具体和确切地说明究竟有哪些是它的共性，又有哪些是它的个性。西方学者中也有人持类似的想法。厄·沃尔夫就认为，不要停留于把中国的情况仅仅与英、法两次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如果扩展一些，与墨西哥、阿尔及利亚、越南相比较，也许更有意义^①。这种意见颇能开拓我们的思路，但可以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相比较的，自然也不限于沃尔夫所提到的三个国家的工商业者。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比较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但运用这种方法之大忌也是简单化和片面性，决不能生搬硬套。在与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状况相比较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央集权大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经过两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究其真正的发端，则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对近代大工业的直接投资。早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许多特点，都是由于这些国内、国际基本条件造成的，因此我们在运用比较方法时就不能离开上述总体条件。譬如地区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以说是中外皆然、概莫能外，但中国各省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整个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欧洲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在经济

^① 陈志让：《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这是作者为他编译的一本中国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文译稿）。

先进的邻国影响下较快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恩格斯曾俏皮地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① 瑞士联邦政府粉碎代表封建宗法传统的分裂派联盟，也曾得到外界的支持。中国国土辽阔，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地方壁垒的森严和省区之间关系的疏远，有的甚至超过欧洲的某些国界。左宗棠的大军给甘肃带去的只是孤零零的兰州机器织呢局，赵尔丰的屠刀更未能把东南地区已经兴起的新的经济引进更为落后的西南边陲。“橘踰淮而北为枳”。如果缺乏一定的土壤和气候，即使勉强引进的新事物，也会退化、衰变以至凋敝而死。

有一些颇相类似并且保存到近代的社会历史因素，在中国和外国起着不同的作用。譬如封建迷信，日本神武天皇“东征”的神话曾被明治维新作为确立天皇制的依据；中国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则始终是顽固守旧的神圣，这也需要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两国社会土壤的差异中来寻找原因。再如讲到皇帝，就不能简单地与君权画等号，也并不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打倒的对象。不仅东方的日本，就是先进的英、荷等国资产阶级，都不惜重金维持皇帝的存在，他们不仅借此粉饰自己的鄙俗，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用来玩弄政治平衡的权术。但在封建势力更为顽强的中国，号称天子的皇帝到20世纪初却不再有世代绵延的机缘。袁世凯改元洪宪仅仅得到瑞蚨祥奉献的龙袍，宣统皇帝借助辫子军的复辟不过昙花一现，以后虽然在关东军卵翼之下当了十来年“康德皇帝”，但毕竟遭到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唾弃。民族心理的变迁由许多因素的错综复杂关系造成，它往往给阶级意识以深刻影响，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解释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合理的答案。

归纳起来，我的意见无非是：多少合理的模式总是产生于历史实际，任何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发展都不会只有一种模式，绝不要把丰富多样的历史内容硬塞进简单的、板滞的框架。

三、类 型

有些西方学者把我们的阶级分析称作类型研究，并认为其不足之处是缺少个案（Case）研究的坚实基础。我认为，如果不是出于对阶级分析的误解或根本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这种意见虽不尽确切，但也不无道理。

^①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

说不尽确切，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历来都强调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中国学者通常也是以个案研究作为基础的。例如，汪敬虞同志《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在论证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城市工商业的变化时，就挑选了交通运输业中的海运和银钱金融业中的银庄，作为“代表两种不同遭遇和命运的典型”^①；在论证中外商人关系的变化时，又挑选了大豆的转运贸易和加工生产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并且明确宣称自己是在作“个案分析”。又如鲜于浩同志《试论川路租股》一文，通过对租股的深入剖析，不仅探讨了“中国近代史上独特的资本原始积累”^②，并且进而论证了“辛亥四川保路运动终能独步一时的重要经济原因”^③，这更是地道的个案研究。当然，在中国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并非只有他们二人。许多有关单个企业、资本家以至行业史的论著，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个案研究方法，尽管有些作者本人不大喜欢这个名称。

说不无道理，是因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毕竟仍属薄弱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类型研究与个案研究都存在着许多空白与弱点。加之过去“左”的影响，公式主义曾经有所抬头，阶级分析往往属于套语标签，更难以获致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但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缺少个案分析这种社会史研究方法，则又未免是以偏概全。问题关键之所在，是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认识路线，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④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占有大量资料，经过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然后才有可能在许多个体剖析的基础上，形成类型的总体理论概括。我国学术界经常强调解剖麻雀的方法、典型与全局的关系，正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而这样丰富的内容却不是个案研究一语所能概括周全的。

当然，从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现状来看，强调加强个体剖析或个案研究是必要的。但应该看到，个体与类型，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较小范围内的类型、一般、共性，在较大范围内则是个体、个别、个性；反之亦然，在较大范围内的个体、个别、

① 汪敬虞：《讨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② 鲜于浩：《试论川路租股》，载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③ 鲜于浩：《试论川路租股》，载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